

中国，不能忘记！

不能忘却之一：为什么卢沟桥竟然成为中日战争爆发地点？

中国，人人皆知卢沟桥是爆发抗日战争的地点。如果有一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突然发问:战争怎么会在这儿爆发呢？这儿是中国和中国的分界线吗？

孩子问得对。卢沟桥并非边关塞外,疆界海防,连万里长城的一处垛口也不是。它实实在在是在北京西南。虽然完全不是中日两国的分界线，但战争又确实在这里爆发。为什么战争尚未正式打响,鬼子已经抄到了京师以南、扼住了我们的咽喉？

至于 1937 年 7 月 7 日侵略者用多少兵力挑起卢沟桥事变,别说不懂事的孩子、懂懂事的大人也很少知道了:

华北地区全部日军最高统计数字只有 8400 人。同一地区的中国军队有多少呢? 仅宋哲元 29 军就不下 10 万。战争爆发之前,敌人不但已经如此深入了你的领土,还以如此少的兵力向你挑战、一个月时间令华北沦陷,查遍世界战争史,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无独有偶,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同样如此。当时东北地区日军 1 万余人,张学良的东北军人数达 19 万。19 万人也未阻止侵略军事变第二天就占领沈阳，一星期控制辽宁,三个月占领整个东北。

我们必须直面那些令人不情愿直面的事实。必须探究,我们是怎样落到了这样的地步,才终于“忍无可忍”的。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 28 艘军舰、15,000 军队迫使大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 2100 万两白银。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 18,000 人、法军 7,200 人长驱直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1894 年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 2 亿两,开辟空前的割地赔款。

1900 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国家虽然不少,拼凑的兵力却不足两万,10 天令北京陷落,赔款数额更是达到空前的 4 亿 5 千万两白银。

一个被西方描述为 GDP 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什么会这样？

发动“七·七事变”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是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荷、比、西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其中第九款规定:

“中国应允诸国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道无断绝之虞。”从此在华北驻屯的外国军队有英、美、法、意、日五个国家,司令部都设在天津。最初约定驻军人数为 8200 人,日军 400 人。后来利用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动荡,日本明里将“清国驻屯军”改称“中国驻屯军”,暗中之则扩大编制,一步步将驻屯军由数百人扩大到数千人。

中国近代历史,往往是先一场悲剧衍生后一场悲剧,前一场灾难导致下一场灾难。正因为面对侵略一败再败,才签下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正因为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才酿成七·七事变前略者已经挺进到眼皮底下的局面。

不能忘却之二：为什么直到 1941 年 12 月 9 日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

从 1937 年 7 月的“七·七事变”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我们常说的 8 年抗战。从 1931 年 9 月的“九·一八事变”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则是更加真实的 14 年抗战。但是从 1941 年 12 月 9 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却只有短短的 3 年零 8 个月时间。

这是怎么回事？七·七事变之后 10 天,即 1937 年 7 月 17 日,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讲话“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态度不可谓不坚决。为什么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算起、日本大规模入侵已经发生了 10 年零 3 个月,从 1937 年七·七事变算起、中国全面抗战已经开展了 4 年零 5 个月,国民政府才终于正式对日宣战？

无须讳言,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参战了: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军偷袭珍珠港。12 月 8 日,美国对日本宣战。于是才终于有了 12 月 9 日的国民政府对日正式宣战。

如今天很多国人未想过为什么卢沟桥是战争爆发地一样,很多国人也不知道迟至 1941 年 12 月 9 日中国才对日本正式宣战。卢沟桥作为战争爆发地是耻辱,美国人宣战了我们才敢正式宣战就不是耻辱了么?美国一旦被偷袭,第二天就宣战,最后一定要把偷袭者打到 Unconditional Surrender(无条件投降)方才罢手;我们早已不是被“偷袭”而是侵略者早已明火执仗了、在南京屠城了、大半个中国被侵占了,竟然还未向对方“正式宣战”,一边进行着抵抗,一边琢磨着妥协,一边盘算着退路。

首先出现的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1937 年 12 月 2 日,蒋介石对陶德曼大使表示:中日可以谈,日方条件还不算亡国条件。12 月 6 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只因侵略者攻陷南京条件大大加码,“陶德曼调停”才宣告中止。

接着又出现了 1938 年 5 月日本外相宇垣一成的代表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触,后因日本陆军强硬派要求“蒋介石下野”,交涉才告吹。1939 年 3 月又有国民党复兴社人员与日本方面在香港悄悄谈判,得到消息的中国共产党方面要求“通缉主和人员”,桂系也表示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谈判才夭折。

8 年抗战也好,14 年抗战也好,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虽然有 1928 年 6 月“皇姑屯事件”、1931 年 6 月“中村事件”、7 月“万宝山事件”、9 月“九·一八事变”、1932 年 1 月“一·二八事变”、1935 年 5 月“张北事件”、1937 年 7 月“七·七事变”,但没有一个事变使国民政府痛下决心与侵略者彻底决裂、撕破脸皮正式宣战,始终没有放弃私下接触与调停,始终在寻找可能的妥协之道。再也没有人比中国人更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退人之兵的了。直到美国对日宣战,才看到有胜利希望,最终鼓足勇气“对日正式宣战”。如果日本不偷袭珍珠港,如果美国不对日宣战,中日之间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又该怎样了结？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历史。真实历史之所以提供启示,就因为它是扎人的荆棘,不是妩媚的花环。

不能忘却之三：为什么抗战中出现集团性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以下 20 多位中央委员、58 位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 210 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

伪政权内部矛盾丛生。而汪精卫与王克敏的矛盾,竟然起源于王克敏投降日本更早,在汪精卫面前摆老资格,不把汪放在眼里;汪精卫为此想方设法将王克敏管辖的华北地区实权悉数收回,用另一个大汉奸王揖唐去取代,弄得王克敏在周佛海面前大倒苦水:“我都快 70 岁的人了,快要入土了,管他什么汉奸不汉奸,反正当不了几年,到时候两眼一闭,呜呼哀哉。你看汪先生,自己下水也就罢了,何必把一些年轻人也拖下水,跟着他当汉奸挨骂呢,他做的可是缺德事情呀!”这种局面让大汉奸周佛海也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这样一批人,把中国政治演绎到如此龌龊和猥琐地步,怎能不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

不能忘却之四：为什么日本侵略者以为短时间可灭亡中国？

长期以来,有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说法。准确的说,只有日军参谋本部《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中出现类似描述:两个月解决驻扎北平一带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三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当然根据他们的逻辑,击败国民党中央军,就相当于征服中国了。

侵略者轻看中国,源于中国统治者阶层抵抗意志薄弱。1874 年日本人侵台湾,清政府为息事宁人,付 50 万两白银让日本退兵,默认琉球人是日本属民。当时英国人李欧尔卡克就说:“台湾事件是中国向全世界登出广告——这里有一个愿意付款但是不愿意战争的富有的帝国”。1875 年日舰闯入汉江河口,朝鲜还击,日本派人来华试探态度。总理外交事务大臣奕訢告之:“朝鲜虽属中国藩属,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自行专立,中国从不与闻”;不但将自己藩属国出卖,更为后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埋下伏笔。

侵略者轻看中国,更是看透了中国社会一盘散沙。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九·一八事变”元凶坂垣征四郎说过一番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这个“中国通”的这番话,真正戳到了我们痛处。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另一个元凶石原莞尔,在中国搞化装侦察,穿着破烂扮作苦力,几次被当地警察扒光搜身,抄走最后一个铜板。石原从切身体验中得出结论:中国官府对民众苛刻,一旦有事,民众不会站到官府一边共同担当。此人一到东北就口出狂言:“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另一个也是“中国通”的侵华元凶冈村宁次,1932 年“一·二八事变”后描述自己赴上海参战的心情“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子飞到淞沪战场”,周围则是“怀着必胜的自信心,抢着同中国军作战的陆军兵将”。

这些人就是以这种心理状态,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的。他们看透了中国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带来的软弱,看透了对手民众与政府的游离与对立,看透了他们的对手不过是几个孤家寡人的首领率领一伙四分五裂的族群。“落后要挨打”在中国更多表现为“软弱挨打”、“内耗挨打”、“腐朽挨打”、“涣散挨打”。就如田汉、聂耳 1935 年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经唱出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不能忘却之五：为什么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统治者以为短时间灭亡中国,只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羸弱。

“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六个月”,也只看到了国民政府掌握的有限资源。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队在华北战场几乎一溃千里,华东和华中战场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也未挡住日军进攻。事实很明显:仅仅靠正面战场和正规军队,中国的抗日战争很难取胜。

真正发现全新取胜资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说得非常有力,被广泛引用。还有一句说得更好,但却很少被引用了:“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触到了中国至弱的根源。

由于长期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封闭和愚昧,加上近代以来殖民地半殖民地处境的摧残和窒息,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品格几乎丢失殆尽,一般中国人尤其是农业人口,在侵略、压迫和摧残面前表现麻木、散漫、冷漠甚至无为的绝望。

是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空前地动员与组织起来。抗日战争中的民众动员,是中国历史上从未经历过民众动员。

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刚刚懂事的儿童,都积极投身到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体系中来。这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景象,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血肉筑起的钢铁长城,由千千万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结成的铜墙铁壁。

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和巨大潜能就像熔岩和地火一样,被长期压藏在普通民众心底。共产党组织,动员民众的核心与关键,不是创造一种全新的理念,而是激发民众心中潜在的火种。那里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民族心灵约定,麻木千年、沉睡千年也会被触发和唤醒。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曾在中国尝尽甜头的侵略者跌入它们最大的战略失算:完全没有想到面前出现了一个全新力量。由中国共产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民众,为侵略者垒起一座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山。

不能忘却之六：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回答“蒋廷黻之问”？



纪念抗日战争从来不乏争论与设问:谁领导了这场战争?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哪个作用大? 国共双方都打了多少战役? 各自歼灭多少对手? ……仅仅把抗日战争看作是一场军事冲突, 似打扫战场清点缴获物那样讨论:你的多? 还是我的多?

这些问题争多少年,也没有一个能超过“蒋廷黻之问”。

1938 年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史学家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发出设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格,历史把它留给了中国共产党人。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的组织和深入的动员,使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贫苦大众第一次认识了自己,认识了抗战,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几千年不曾认识的自己拥有的力量。这一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民众从传统的家庭观念、家族观念向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迈进,从而积极、主动地投身到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中。中华民族第一次形成全民共识:为了生存、发展、繁荣、昌盛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肌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国家。

1912 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30 余年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最终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稳定、持续、繁荣、既能完成民族救亡、又能完成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

历史证明:只有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和集体判断。

1949 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而且从根源上清除了“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中国人民被前所未有的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全民抗战中的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培育新社会的摇篮。新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稳定的、繁荣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今天回顾可以清晰看到,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没有反抗侵略中锤炼的战斗队伍,这一胜利肯定不会这样快的到来。

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坚强的民族组织,成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成为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这句话说出了一百多年来所有中国人的心声。

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4 年 3 月在巴黎纪念中法建交 50 周年大会上也讲了一句话:“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作者:金一南,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